



格非：全世界都在写同一本书

○ 本刊记者 关悦 学生记者 刘昱

格非

原名刘勇，著名作家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讲写作、小说叙事学、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。主要著作有《格非文集》（三卷）、小说集《迷舟》、《喙哨》，长篇小说《欲望的旗帜》、《人面桃花》、《山河入梦》，文论集《小说艺术面面观》、《卡夫卡的钟摆》等。

当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位于新斋的中文系会客室时，格非已经静静坐在窗下，并为客人和自己都备好了水。午后明亮的阳光下，他的面容在背光的暗影中显得分外沉静。他的表情不多，声音却饱满而富有节奏感；他回答问题看似不假思索，却清晰而完整。满头与年龄并不相称的花白头发，似在默默讲述其主人所经历的那些艰辛而长久的思想跋涉。

作为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，格非可称是当代文学演变的亲历者。与此同时，大学教授的身份又为他提供了更多积累、观察和思考的机会。这使得他在谈及文学和教育的话题时显示出宏大的视野、敏锐的视角和一针见血的判断力。

交谈中，格非甚少提及“责任”二字，但从他的话语中，却处处流露出一位作家和学者所自觉具有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事，“所以我欣赏这个观念——全世界都在写同一本书。”他说。

文学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基本点

记者：看您的很多作品，都提到“乌托邦”、提到对理想的追求。那么您的乌托邦是什么？

格非：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现实性，每个人也都在超越现实条件的想象中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“乌托邦”，反正每个人都有对现实超越的要求，因为现实总是让我们不满意。我写了《人面桃花》以后，很多人把它解释为“反乌托邦的乌托邦”，可能很多人会从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。

我觉得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多问题，这都是现代性造成的。从个人来讲，我当然有很多幻想。最大的幻想，我当然愿意生存的压力更小一点、自己给自己的自主性能够更强一点。简单来说，我觉得目前的生活，它的规律性、规定性等很多方面对我来说太强了。而作为一个作家，我希望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自然一些、亲和一些、简单一些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带有更多的装饰性。这种装饰性使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很难判断。太多的装饰性、功利性，使得我们变成自己的反面。

记者：像您说的这种装饰性也好，功利性也好，当下的文学是不是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？

格非：说到文学的现状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现代性造成的。文学本来是一种特别简单的东西，我们过去称之为“神秘的经验”，是一种少部分人所拥有的，不是特别重要、也不是特别不重要的存在。过去传统文学是处在一种业余状态，作者写作没有稿费，“专业作家”是不存在的。大部分是官员、政治家、读书人，兼有很多职务，他们在业余时间创作。可是自从18世纪现代文学在西方产生以来，它变得特别重要了。文学的社会性、社会功能被强调，同时它跟资本、市场的关系开始建立起来。现代社会，创作慢慢变成一种职业，要与市场发生很多关系，完成一种交换。这样一种交换关系当然给文学带来很多活力。特别是印刷和传媒的发展，使得文学传播的面增加了，使得大量人的阅读成为可能。但这也同时给文学造成很多问题，就是过于市场化。文学娱乐的一面被过分强调，大家可能把作品的销量看得特别重，会把作家的言论、地位看得特别重，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公益性。

记者：那您是否认为文学仍应该是属于少数人的？

格非：我不这么看。其实在过去文学也不合理，因为权力被少数人垄断，知识也一样。启蒙运动以后，他们才进入大众的交流层面，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创作、阅读的权利，这是一个进步。可是它也带来了上面所说的更不好的方面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不应进步，文学不能再回到属于少数人垄断的时代。如果现在说文学属于少数人，那么这少数人不应该是经过选择的，即所有真正喜欢文学的人谁都可以写作、阅读。而过去如果不是贵族的话，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，想都别想。所以我觉得文学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基本点。

记者：说到寻找基本点，您一直被视为“先锋派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但不少人认为您现在的写作比较倾向于回归传统。您自己也曾说过，在经过了许多年“怎么写”的训练之后，应重新考虑“写什么”这一问题了。

格非：也不能说“回归”传统吧，因为传统有很多条件，是无法回归的。时代的条件消失了，就不可能回去了。而且我们也不能无视现代文学近百年来探索。我之所以说相比“怎么写”，我更重视“写什么”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的经验都被遮蔽了，用本雅明的话就是“经验遭到很大的贬值”。

现代文学出现后，它变成闭门造车的状态，它可以通过虚构、想象，不用再依赖自己的经验。对这个过程我充满警惕。过去我们强调通过各种方法来表述，但是我们最终忘了最重要的东西——我们和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？怎么看待自己的经验？要不要开凿这个经验？对经验的要求取决于你怎样生活、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。换句话说，你的修养、坚持、道德底线，所有这些都成为写作最核心的部分。但是这个部分被我们忘掉了。比如你的某种意图和生活不一致，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坚持？大部分人不行的。你的修养、素质、品格本身很差劲的话，换再多方法都没用。所以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，方法当然重要，但是“写什么”的经验更重要。

记者：那您的经验是从何而来？

格非：我在90年代之前写的大多数作品都是

关于农村的，那是因为我大部分的经历和记忆都在农村。60年代末和70年代，农村社会是相当复杂的，而我对它非常了解，它们是真实的生活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的写作都是关于乡村的。但是我在城市里生活也有将近30年了，不可能对城市毫无感觉，所以最近也开始写一点关于城市的东西。

记者：那这种经验具体怎样变成写作的灵感？

格非：一是在写作之前，你会已经有很多写作的计划了，脑海中会有很多从生活而来的储备。比如说我会想去思考大学到今天是怎么变化的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是我们的同学。今天再见到他们时，大家说话的身份、腔调都变了。过去身份高的是成绩好的、当班干部的人，现在身份高的变成是财大气粗的人，他们会左右一切，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。这种状况是突然出现的，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给我的一个巨大的刺激。我已经写了两篇这方面的小说，一篇叫作《不过是垃圾》，一篇叫作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。我希望能够写10篇这样的作品，但是现在还有个长篇需要完成，写完后我才有时间写这个。所以在你决定写什么之前，已经有很多东西排着队等你去写了。

第二个方面，你在写作过程中，会有一个很神秘的过程，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来的构想去完成，这需要你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匠，这也是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训练。一个好工匠有很好的经验作为支撑，就像“庖丁解牛”，因为整个过程他很熟练，写作的“刀”从哪里下去，完全是凭直觉的。所以好作家的前提，也是要多写。

警惕“他人领导”

记者：现在有些作家写作时完全从自己的视角出发，您怎么看待这种个人经验？

格非：那不叫个人经验，因为个人经验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些都是虚伪的、假的经验，已经被引导了。用什克罗夫斯基的话说，就是“形成了某种自动化的变式”，背后的话语在左右你，其实你是被选择的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，提供不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。放眼望去所有人都一样。真正要找到个人的经验、表达个人的声音很难。我不反对去寻找，但是要警惕虚伪的经验。

记者：那您认为现在的新生代作家，比如说90后，他们写作时的经验是虚假的吗？如果想让文学往好的方向走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

格非：我不认为他们的经验是虚假的。对于90后的作家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经验。这个和我们60年代的作者很不一样，但他们也受到自动化变式的影响。当然这种情况在我们60年代的作者身上也存在。比如功成名就的人，生活之间的关系就疏离了。例如你不去菜场买菜了，怎么写菜场？过去生活是艰苦的，而现在生活都变成概念了，整天在斟酌饮食，谈的都是空洞的东西，不付出情感、想象。这和以前完全不同。

一个人的生活变虚假以后，作品不可能真实。功成名就后对生活切实的感受就失去了。以前支撑文学最重要的是经验，现在得来太轻易了，通过网络可以很容易获得信息。但是通过信息来写作是错误的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。比如描写农民工，浮光掠影地看是没用的，因为你没有农民工的视角。即使你去和他们生活两个月，也想象不出他们的情感投入。所以90后并不是说没有经验，有些作品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总体来说还没有成熟，还没有特别好的作家出现。

记者：在这样一个网络化生存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谁都可以写作，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？对读者来说，常常会觉得困惑：究竟该怎么去选择？

格非：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要问：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写作？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，还是某种文化的结果？如果是自然的状态就无法批评，但如果是文化的结果我们就应该反思。按道理，交流不必一定通过文学展开。只是文学普世化后，大家都可以从事写作活动，这个门槛降低了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受到文化的诱导——我觉得文化影响的结果更大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发出的声音能够被承认，每个人都希望通过吸引眼球的方式获得存在的证明。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错误的，将自我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，恰恰是里斯曼所说的“他人领导”。所以我一直坚持不开博客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当然这样一种交流是会有有效的，但这个社会信息已经泛滥了。

记者：那您怎样看待现在的“国学热”？或者说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潮？

格非：炒作的“文化热”有一定好处，让

大家关注中国有这些传统经典，这种普及作用不能抹杀。但是这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即把所谓的传统文化也变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，大家把它更多地作为装饰，而不是生活的指导。过去的经典很多是基于社会条件产生的，过去的学术很重要的一点是：文化是需要我们担当的，选择了某种思想就要付诸行动，对人生有所改变。比如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这些读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意义，会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。但是今天这种知识和行动之间的链条已经被割裂了，知识变成了某种装饰，显示学问的谈资，这是没有意义的。

记者：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：阅读一些文学作品时，会觉得很痛苦，而不是一种轻松、愉快的阅读体验。这是文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吗？

格非：如果你追求一种真实的生活，那么这样的痛苦是值得的。这是一个会很快过去的过程。如果你看作品时觉得很沉重，你有两个选择：一是放弃，不要执着太深；二是熬过那个阶段。就像很多人听音乐听不了巴赫、贝多芬，听不了勃拉姆斯，听贝多芬也就只听一些小曲子，是因为很多人不愿去深入，深入就会有痛苦。文学也一样，你了解真正的贝多芬、勃拉姆斯，就要有一个逐步深入的痛苦的过程。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刚接触卡夫卡的作品，也感觉到一种痛苦，但因为是读文学专业的，不看不行。这个阶段熬过去了，文学就会向你显示它最光辉的一面。比如卡夫卡的作品充满悲剧色彩，但是当它成为你阅读经验的一部分，你重新再看，就会发现其中的喜剧性。你会发现他并不是故意要把这个世界写得很黑暗，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。你会有很强大的心理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，这时卡夫卡就成了你的好朋友。当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时，你就会想起那个急性子的“K”，他总想简单地把事情解决，却总碰到“莫须有”的罪名。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类似的事情，这时你和他就成了一种知音、盟友的关系。

记者：那么您觉得哪类作品对您影响最大？能否请您给大家推荐一些您认为经典的作品？

格非：我喜欢的作品类型很宽泛。我是一

名教师，需要广泛去了解各个方面，所以很难说我更喜欢哪个类型的作品。而且现在很难作区分，因为每个流派的产生都有它的道理。一方面可能由于叙事本身的变化，如文学的技巧一直在变化；另一方面，文学所描述的社会本身也在变化。比如过去中产阶级的女性，她们的阅读速度非常缓慢，能读的东西也不多，因此作品的叙事结构比较慢是可以的，但是现在慢速的作品则是不能忍受的。所以社会本身也会提供很多要求，使文学作品不断发生变化。所以无从说起哪一部分作品是好的，哪一部分是不好的。

至于推荐，我有些特别偏好的作家，可是这不能说明问题，所以如果让我提供名单，可能会误导。我过去也犯过错误，过去不太喜欢某一类型的作家，后来慢慢喜欢了，甚至狂热。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我在读书时根本无法理解他，可是到了三十来岁重新再看，会被他折服。所以读书的话，还是建议多读经典作品，它们一定是有道理的。先建立自己的阅读体系，然后才能判断。很多人都不想走弯路，想直接去读某些推荐作品。但是有时必须走点弯路，建立体系，这样你的判断才会有道理。多年前有人建议我去读村上春树，我当时认为他只是一个流行作家，是不能去读的。但是很多年后，我重新去看他的作品，觉得他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。所以文学史中有大量作家有待发现，而且所谓的经典在每个时代都会有所调整。一方面我们最省事地去读经典作品，一方面也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，因为经典也是在变动的。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判断力。

好作家，先从“好工匠”开始

记者：您觉得好的作家是能够被教育出来的吗？还是天生的？

格非：作家是没法教育的，大学不承担这个任务，甚至大学有中文系也只是一两百年内出现的。今天我们说文学进入大学的范围，主要培养的还是研究者。作家在社会上培养是最好的，大学可以提供必备的知识面，所以好的作家至少应该接受大学教育。当然依靠自学、天分也可以达到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盲目的，而大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或平台使人接受知识。写作的才华大学不能提供，你的生活经历大学也不能提供，它仅能提供一定的背景知识。我提倡人们去大学学习，提高修养，像韩寒那样的毕竟太少数了。

记者：那您觉得大学中的文史哲学科究竟该怎样定位？您说大学中主要还是培养研究者，但是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做研究啊。

格非：清华在这方面已经算做得好的了。在人文学科方面的学分上作出硬性的强调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但是从全国的高校教育来说，人文应该作为每个学生的必修，到了专业阶段再去做研究。本科期间学习文史，对于所有学科都是公共的，可以作为思维、文化修养的训练。清华就把文史哲打通，开始时不分专业。但是我觉得做得还不够。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就业的压力，全世界都是如此，毕业后只有极少部分人从事专业研究。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把它作为通识教育，或者说博雅教育，将之纳入大学体系。

记者：您开头时提到，要成为好作家，必须先成为熟练的好工匠。那如何做才能训练成为“好工匠”呢？

格非：我很小的时候就遇到很好的老师。小时候我们去登山，我们的语文老师就说要把句子写漂亮。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句子，比如“把白云拿下来擦擦汗”。我们那时候很小，觉得这种句子很浪漫。但是写出来给另一位老师看，他却说这是最不好的语言。我们不应该把经验程式化，而是要朴实地面对你所面对的、你具有的经验。好的写作就是把你的经验能够通过一种方法充分地表达出来。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很多中学老师让背很多范文、方法，虽然这也是必要的，可以从一个无法无天的状态变成规范的状态，但是老师应该同时也告诉学生，这些方法并不是唯一的。能同时兼顾这两方面的老师才是好老师。可是这样要求中学老师，是不太可能的。

记者：那您在上写作课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？

格非：我让他们乱来，希望他们乱写。我在大学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：让他们把中学学到的东西全部忘掉，必须打破“写作会害羞”的界限，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经验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学生在感情、在性的方面都放开了，可是在其他方面压力还是很大。（笑）写作要让学生处于自由的状态，而且要让他们在得到很多专业训练之后还能有自由的状态。✎